

历史知识丛书

伟大的 会师

WEIDADE
HUI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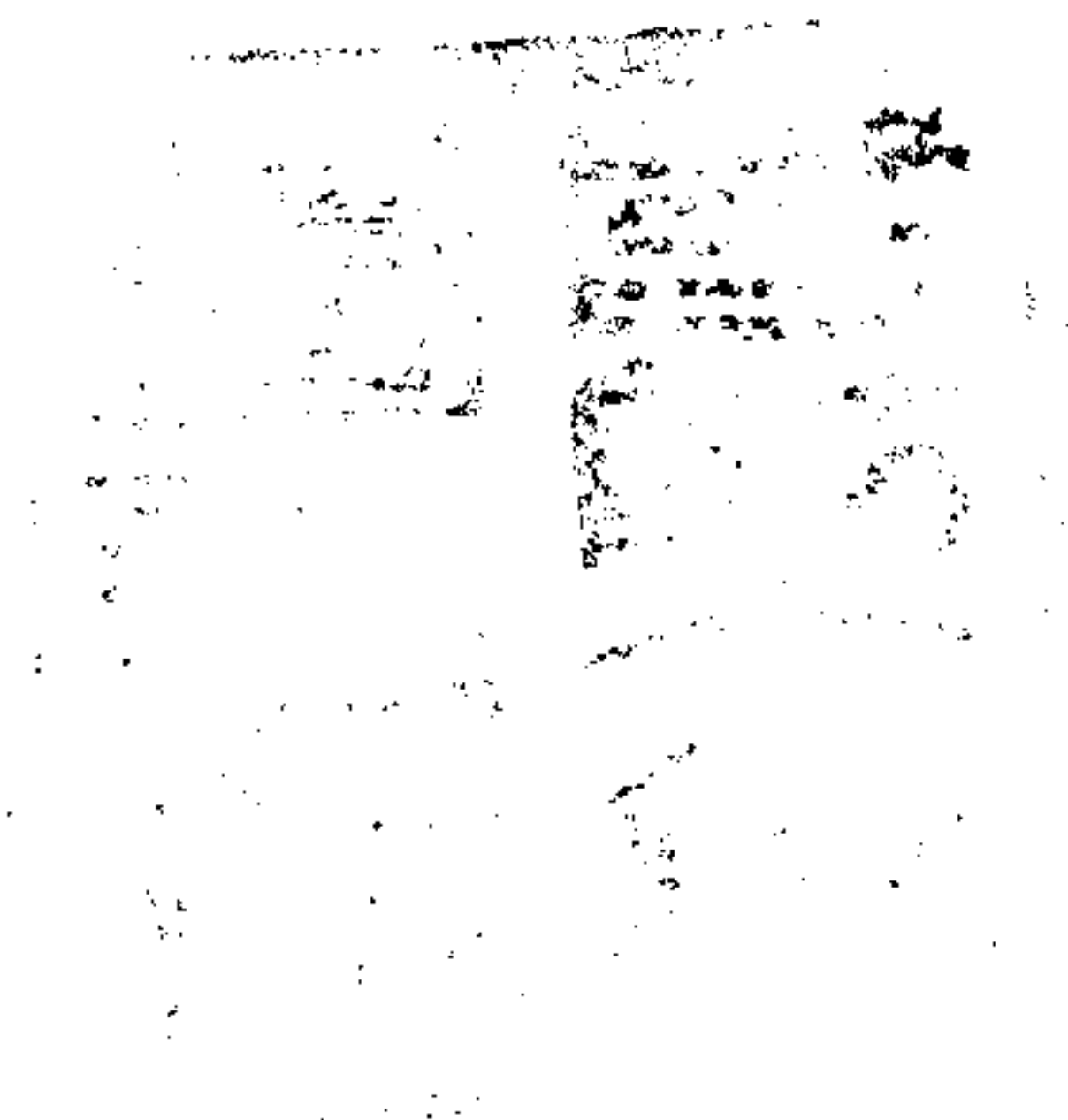
西人民出版社



2 035 3135 7

历史知识丛书

伟大的会师



也 辰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南昌

历史知识丛书
伟大的会师
也 辰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鹰潭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字数9万
1986年5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统一书号：3110.120 定价：0.70元
ISBN 7—210—00052—6 D·11



目 录

- 1 写在前面的话
- 1 严重的时刻
- 5 举行暴动、起义的决策
- 11 叶挺和他的“铁军”
- 14 贺龙与周逸群
- 19 朱德和军官教育团
- 21 周恩来紧张部署南昌起义
- 29 “八一”枪声
- 34 庄严的宣告
- 39 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 45 张家湾军事会议
- 49 武昌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7年8月1日举行的南昌起义，创建了中国人民的第一支军队。于1927年9月9日爆发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会合了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以后，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不久，“八一”南昌起义军一部转战湘南，与湘南的地方党组织配合，发动了湘南暴动，由此诞生了湘南农军。他们在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接应下，登上井冈山，与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时隔几月，由平江起义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也上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的组建，是由四个起义（暴动）、五支部队共同完成的。

严重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于1926年7月出师广东，共同发动了北伐战争，向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代表的军阀开战。北伐战争受到全国工农商学各界群众的拥护、支持，北伐军官兵个个热血沸腾、奋勇争先。所以，只



经过短短几个月，北伐军就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各省；并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大获全胜的形势下，顺利地进驻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江浙财团的老巢——上海市。

就在这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混迹革命阵营、用阴谋政客手段窃取了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的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在英、美等帝国主义收买、支持下，与江浙财团结合，一边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一边率先高举屠刀，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截止4月15日，就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多人被害、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紧接着，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下令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肖楚女、熊雄等一百余人，逮捕二千一百多人，驱逐二千多铁路工人；与此同时，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的国民党右派，也都纷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清党”和屠杀。

盘踞东三省和京、津及河北等一部分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甘落后，立刻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于4月28日将李大钊、范鸿劼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挹兰、邓文辉等二十余人残暴地绞死。

4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他的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国民政府”。

还在1926年底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为了使国民党政府更好地督导北伐战争进行，决定把政府和党部驻地由广州迁往武汉；蒋介石为了更充分地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

权，却坚持要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到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南昌。双方为此争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甚至于施展流氓手段，扣押了部分途经南昌前往武汉的政府成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但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持下，蒋介石的阴谋终告失败。

因此，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形成一个国民党的两个中央党部和两个“国民政府”分立的局面。

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是汪精卫。

汪精卫自认为是孙中山的嫡传，又在国民党内资格老、地位高，便以此为资本，企图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所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仍然戴着“国民党”左派假面具的汪精卫，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压力下，在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会，发布斥责蒋介石的命令，宣布开除他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他。

在这种形势下，受武汉国民政府统辖的北伐军，是配合欲由陕西出兵东进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还是顺长江而下讨伐蒋介石，就成为共产党及武汉国民党中央内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

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等主张乘蒋介石“国民政府”立足未稳之机，东征讨蒋。为此，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意见说：“……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再不先进，

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但是，左右中共中央方针政策的苏联顾问不愿过早同支持蒋记政权的帝国主义冲突，坚决主张继续进行北伐，企图以此打通与苏联的通路，待取得国际援助后，再同蒋记政权决战。于是，中共中央也就主张北伐河南，接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东出潼关。

中共中央的这个主张，正中汪精卫等的下怀：他们本来就惧怕给蒋介石撑腰的帝国主义、屈服于蒋介石的威胁，下不了东征讨蒋的决心；更何况，他们早就同蒋介石集团勾搭，订了密约：“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后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所以，汪精卫集团决定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出兵湖北，进军河南，配合冯玉祥、阎锡山部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

这边，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等率领部队继续北伐；那边，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八次扩大会议，再一次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来一个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参加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立即动员二万共产党员、五万革命工农，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军队。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害怕触怒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不仅拒不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个指示，而且拒绝蔡和森“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的正确意见，更不准毛泽东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反击“马日事变”，反倒下令解除工农武装；进而又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之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病假”名义退出政府；甚至于竟然规定



“工农民众团体等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

但是，陈独秀等的诸如此类的退让、妥协、投降，并不能阻挡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实行同流合污。在冯玉祥的撮合下，汪精卫与蒋介石言和。汪精卫决定“清党反共”，下令唐生智率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北伐部队返回湖北，名义上是加强长江方面的防务，实际上准备镇压南方日趋高涨的工农群众运动。

在这种气氛下，6月28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通电，要求汪精卫、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人分离”，勒令共产党人退出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解散一切工会、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和其他一切革命团体，并下令第三十五军移驻汉口，准备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这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革命力量已经被摧残得所剩无几。十分明显，汪精卫撕下假面具的时刻指日可待，革命事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举行暴动、起义的决策

还在“马日事变”发生前，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就坚定地主张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反抗；后来，蔡和森、李立三又提议以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全部武力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部叛变，即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进攻湖北与广东。为着实现这个目的，还要发动一切工农群众，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毛泽东不仅公开进行宣传，要求

中国共产党团结湘鄂赣以及江浙闽等省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反对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而且采取积极行动，准备在湖南组织反对唐生智的暴动；周恩来亦在到达武汉后，通过周逸群等人，努力联络革命将领如贺龙等，征求他们对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意见，……此时此刻，只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极少数右倾投降主义者，仍然把汪精卫捧为“领袖”，把“东征讨蒋”的愿望完全寄托在唐生智身上。所以，他们不顾何键已经公开通电反共的客观事实，继续一味迁就汪精卫，下令纠察队、童子团交出全部武器，甚至木棒，“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以示拥戴之意”；共产国际驻中共顾问罗易甚至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紧急指示副本拿给汪精卫看，以此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友好。而汪精卫却在拿到这个副本后，信口雌黄，硬说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是“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企图消灭国民党”的证据，在1927年7月14日晚，不顾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人的坚决反对，召集国民党右派举行秘密“分共会议”，通过《制裁共产党决议案》等，15日正式宣布反共，20日发表“分共”宣言，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密令何键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最终失败。

就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几天（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任常委，陈独秀停职。

中国共产党临时常务委员会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严厉地揭露、痛斥了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政策，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共产党员，明确宣告：“……一切工



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资产阶级的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

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迅速安置、调动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的工作岗位的同时，还作出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第二，着手发动、组织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广大农民在秋收期间举行秋收暴动；第三，领导和发动仍由共产党人掌握，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

这里所说的受共产党人掌握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是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及其所属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和警卫团。这时，他们已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的“东征讨蒋”命令，离开原驻的武汉及鄂东一带，正向九江前进。

所谓的“东征讨蒋”行动，不过是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它们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争夺长江下游地盘和国民党军政大权的一场狗咬狗斗争。但是，共产党也支持这所谓的“东征讨蒋”军事行动，其原因是陈独秀想通过支持汪精卫、唐生智发动“东征讨蒋”战争，延缓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动，并期望能够通过“东征讨蒋”战争打败蒋介石；而周恩来等人眼看汪精卫集团的反共阴谋即将付诸行动，便打算将计就计，以“东征讨蒋”为借口，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企图回到广东，与盘踞广东的李济琛决一雌雄，实现其独霸广东的野心，把收容了大

批受迫害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第二方面军调离已经成为反革命中心的武汉，开回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东，东山再起，进行第二次北伐。

汪精卫集团早已看到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容共”政策，会给共产党造成种种有利条件。但他们正在用人之际，不愿过早对第二方面军下手，就布置唐生智所部沿长江北岸东进，令汪精卫死党朱培德所部驻江西境内南昌、樟树一线，把沿长江南岸而下的第二方面军夹在其中，督其为“东征讨蒋”卖命，获胜他们则渔人得利；第二方面军失败或有异常举动，则可以让唐生智、朱培德部对他实行夹击，聚而歼之。所以，第二方面军此时此刻处于一种非常微妙而又尴尬的地位。

七月中旬，由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到达江西境内，第四、第十一军大部驻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沿线，第二十军也已渐次到达九江及其附近。由于汪精卫已经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著名共产党人如林伯渠（祖涵）、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恽代英、吴玉章等在武汉站不住脚，遂纷纷到达九江。为着接待过往九江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方便，吴玉章在九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张发奎见汪精卫已经公开与共产党决裂，担心自己继续采取“容共”政策，会被唐生智、朱培德及蒋介石部队消灭；同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相当不少，特别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他们统领的部队也十分倾向共产党、倾向革命。如果这些部队发生变故，张发奎的老本就会丧失得一千二净。所

以，张发奎心中蠢动，意欲反共，而共产党方面，虽然看见张发奎已露反共端倪，但还希望利用张发奎回广东争地盘的野心，拉住张发奎，便继续公开进行与张发奎合作回广东的宣传；同时，也警觉地认识到，张发奎进行反共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作出了“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的决策。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当即向军事部的主要干部传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这个决策，并指定聂荣臻为书记，贺昌、颜昌颐为委员，组成前敌军委，出发去前方，通知带部队的我党干部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开始行动的命令。

这时，张发奎正准备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召集的解决第二方面军中共共产党人的会议。他毫不掩饰地命令：“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

面对这种危急局面，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聂荣臻、叶挺在九江举行了“谈话会”，主张立刻抛开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政策，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第二十军与共产党采取一致立场，在政治上以反对武汉、南京进行号召，在南昌实行暴动，解决朱培德的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会后，他们立刻向党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意见，又派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登上庐山，同正在山上的瞿秋白和鲍罗廷（苏联军事顾问）商量。瞿秋白完全同意“谈话会”提出的意见，并于第二天乘轮船前往武汉，向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报告李立三等人的建议。

时过几日，风传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即将举行；张发



奎并命令第二方面军部队在九江、德安待命。很明显，张发奎的反共行动，已如箭在弦上。

23日下午，邓中夏、谭平山、彭湃、恽代英举行第二次“谈话会”，决定部队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因为事情紧急，他们敦促仍在庐山的李立三等立刻回九江。待李立三等回到九江以后，他们继续进行“谈话会”，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提出内容包括“没收大地主土地”和“实行劳动保护法”的政纲，又决定叶挺部应早贺龙部一天于25日到达南昌。

与此同时，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任务是负责筹备起义、全权指挥起义后的前敌工作。为此，周恩来立即赶到九江，召开会议，向在九江的李立三、恽代英等传达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征求他们对此决定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起义的中心口号、土地革命等问题。在讨论土地革命政纲时，发生了分歧：恽代英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革命；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认为没收大地主土地，会惹起反动势力的加紧联合和革命军队内部的分化。周恩来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会后，即7月26日前，叶挺及贺龙所部分别坐车、步行，先后由九江向南昌集结。在行至涂家埠时，由于涂家埠铁路大桥已被朱培德部破坏，当地中共党组织组织了数百铁路和锯木工人，苦战一夜，于27日凌晨四时修好大桥，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抵达南昌。



叶挺和他的“铁军”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惠阳。

叶挺幼年时家境贫穷。他便一面劳动，一面在本村小学上学。1911年考入惠州府立中等农业学校。同年4月，他因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不顾家庭的阻拦，独自前往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小学。1914年12月结业后，又前往湖北，进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其中以《新青年》对他产生的影响最大。1916年底，叶挺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工兵技术。1918年毕业后，他原打算去德国留学，由于经济困难，结果没有去成，便改变计划，前往福建漳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于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因为作战有功，1920年10月，叶挺升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1921年调到孙中山的总统府警卫团，与充任第三营营长的张发奎同事，当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反叛，调兵包围，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张发奎起先与警卫团官兵一同抵挡陈炯明叛军，后见大势已去，便归附了陈炯明；叶挺却身先士卒，率部一再击退数倍于己的叛军的攻击，并在叛军的炮弹击中总统府，引起漫天大火时，奋不顾身地带领官兵掩护孙中山出走总统府，脱离险境，前往黄埔，登上永丰舰。之后，叶挺又孤身护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总统府突围出来，到一位女友家中避难。

1923年2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政府。

叶挺被任命为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

1924年国共实行合作，苏联接受孙中山提出的派人前去学习军事的要求。叶挺得讯，坚决要求前往苏联学习，得到孙中山的同意，遂于1924年冬，第一个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刻苦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认真学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在对苏联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与学友聂荣臻等努力探讨中国革命问题，迅速从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叶挺在莫斯科大学学完，回到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随即又任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团团长。同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立，叶挺被任命为独立团团团长。这是国民革命军中由共产党员任主官并完全控制的第一个团级战斗单位。

叶挺经常向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等汇报工作，使独立团始终牢固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中共广东区委指导下，在叶挺直接领导下，独立团不仅成为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还积极支持广州及广东的工农运动，坚决镇压反动地主武装的反扑、进攻，为保卫工农群众利益、巩固和扩大农会和农民武装，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6年5月，叶挺的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首先进入湖南。在无数次激烈战斗中，基本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独立团英勇善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盛名四传。特别是1926年8月26日，北伐军进攻吴佩孚主力扼守的军事要隘汀泗桥时，因屡攻不下，便调来叶